

身体、符号与媒介

□ 王 彬

摘 要: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各种媒体新技术的发展,黑暗中的人类身体得到呈现和关注,并日益成为各科学术理论话语的焦点。由于身体呈现技术的发展和演变,青少年成为一个新的文化族群被创造。在身体成为各种哲学、美学理论热点的时候,从身体出发并达于身体的现代传播却倾向于将身体逐出人类传播的领地。现代化的传播技术不仅完全改变了人类信息传播的模式,而且根本改变了身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功能和作用。本文主要研究人类传播历史中身体、符号与媒介的关系,考察身体在人类传播中作用与功能的演变,指出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大众传播越来越忽视了交流的物质现实,即身体;剖析无视身体的符号化传播的社会文化后果;认为在网络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背景的今天,身体在场的人际交流更成为不可能的传播乌托邦,而被誉为后喻文化的网络媒体更成为青少年隐身的理想屏障。

关键词: 身体;符号;媒介;现代传播

在《交流的无奈》(speak into the air)中,约翰·达勒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以历时性为框架,考察了西方世界不同时期传播模式和交流观念的嬗变。彼得斯将人类传播模式大致归结为两种:以苏格拉底和孔子为代表的对话和以耶稣为代表的撒播。从传播模式的演变来看,彼得斯关于对话与撒播的区分是有一定合理性和说服力的。然而,彼得斯没有充分考虑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的历史演进。麦克卢汉恰恰以“媒介即讯息”、“媒介即人的延伸”等观念强调了这一点^[1]。在彼得斯所考察的传播观念中,传播媒介不是口语语词,就是书面化的符号文本。与孔子、苏格拉底和耶稣借助口语言不同,中世纪神学、近现代哲学、招魂术、传心术、催眠术和现代传播都借助符号化的书写文字。虽然前者对书写和记录异常谨慎,但却对语词力量深信不疑(但东西方对待语言/言语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西方不仅对语言/言语表征现实和真理的能力深信不疑,而且赋予语言/言语神秘的魔力。在古代中国对“言一象一意”关系的争论中,语言/言语历来表情达意的功能就受到质疑。但这并不妨碍语言/言语在中国传统中的文化地

位)。在他们看来,语词不仅能表征现实,传情达意,促进交流,而且能促使人行动。孔子强调名正言顺,苏格拉底关注言语性的问难辩驳,耶稣则处处以身体表征言语化的神意。看来,彼得斯不过也谨守语言中心主义逻辑。孔子、苏格拉底和耶稣强调身体在场,但其交流是通过口语语词实现的。对他们而言,真理并不源于个体,但语词无疑具有表征现实、传播真理的能力。语言(包括口语和书写文字)一旦成为传播媒介,人类传播格局也就根本改变了。

一、身体与媒介

在前语言阶段,身体是唯一的交流媒介。其交流模式为:

身体→身体=媒介→身体

图1

图1表明:前语言阶段,信源、信宿和信道三位一体。在身体与身体的接触中,交流完成了。由于没有其他交流媒介和手段,前语言交流就是身体的触摸、抚摩和碰撞。手势、气味、呼吸和声音等都成为

交流的媒介。身体在场并全面投入交流过程,身体的各种组织和感官系统都担当着信息-媒介、媒介-信息的双重任务。在这里,身体与媒介同一,身体即媒介,媒介即身体,身体是交流的唯一现实和依据。前语言的身体交流简单、便捷,但身体同时也构成交流的界限。身体只能用简单的耸肩、咕哝、比画和呻吟等有限手段传递信息。无疑,这种以身体为媒介的交流是直接的,也是笨拙的。身体有限性和笨重的实存现实成为交流的负担和拖累。遗憾的是,麦克卢汉和彼得斯都诡异地忽略了人类交流的前语言阶段。

前语言的身体交流并不能满足人类自由交流的梦想,身体总在寻求超越身体和现实事物的秘密方法。以语音音响为特征的口语就是人类找到的最早的替代性交流媒介。于是,交流进入口语化阶段。早期阶段借助身体在场的交流是一种人际交流,对交流双方而言,身体在场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但由于传媒技术的局限,身体不能传播。交流双方互为镜子。

身体→语词/身体→身体

图2

图2表明了口语阶段的交流模式。与前语言阶段身体即媒介的交流方式不同,口语阶段的媒介是语词和身体。身体虽然在场并积极参与交流,但身体在交流中的地位无疑经历了战略性的调整。交流重心开始转移,身体不再与媒介完全同一,而是与媒介发生裂痕、产生分歧,并最终分道扬镳。口语交流中,身体在场,但身体的表情、姿态、动作往往沦为对话的伴随状况。口语部分取代了身体,身体成为语词的伴随状况和补充信息。语词使交流摆脱了现实的拖累,身体因此获得部分解放。交流超越了原始的简单层面而呈现出新格局。

如果说前语言交流以身体的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和味觉等为基本前提,那么,口语交流则大大增大了听觉的感知比率。前语言交流是身体全面参与的交流,按照麦克卢汉关于冷热媒介的划分,身体无疑是冷媒介。口语阶段,语词媒介的清晰度相对提高。如麦克卢汉所言:“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口语语词作为新媒介不仅部分截除了身体的功能,还要求身体器官组织新的比率,身体原有的感知平衡被打破。听觉部分压抑了视觉、触觉等,经验由占主导地位的听觉来安排。

不过,口语阶段更富革命性的重大变化在于下列事实:前语言阶段的身体媒介与口语阶段语词媒介结合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媒介杂交催生了苏格拉底、孔

子和耶稣等先贤圣哲。这些古圣先贤既不排斥身体,也不拒绝语词,而是将二者水乳交融。

在上述两阶段中,交流的共同前提是交流者身体的在场。虽然语词使身体部分解放,但交流依然倚重身体。身体在场为交流保留了更多的人格内容和个体特征。“口语词使人的一切感官卷入的程度富有戏剧性”,“我们说话时倾向于对每一种情景做出反映,甚至对我们自己说话的行为本身也用语气和手势做出反映”。在口语阶段,交流摆脱了实存现实的限制,但交流并未截除或完全截除身体,身体有限性依然是交流的桎梏。交流自由的梦想督促人去探索更具超越性的交流媒介和交流方式。身体媒介、语词媒介倏忽即逝,难以追踪。应该找到记录、固化交流内容、交流场景的新媒介。于是,书写文字诞生了,人类从此进入符号传播阶段。

二、退隐的身体与增殖的符号

作为替代实存现实的象征性符号是人类传播史上最重要的技术创造。符号摆脱了现实事物的局限,超越了身体。符号化传播阶段,身体退隐为传播的终端,传播媒介却逐渐被外在于身体的物质技术和机器设备所取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越来越多样化、精细化。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人的延伸”,像头脑、躯体和四肢一样,媒介成为人体的组成部分(像忽略前语言阶段的人类交流一样,彼得斯同样没有区分符号传播的不同阶段)。整体上看,符号化阶段的传播方式可用图3和4表示,它们分别代表20世纪以前的纸质媒介阶段和20世纪开始的电子媒介阶段。

(身体)……→符号→媒介→符号……→(身体)

图3

图3表明了以书写文字为代表的符号化传播模式。具体的身体将信息编码成特定的符号文本,符号文本以书写文字记录并经由报纸、书籍等物质性载体得到传播,接受者首先接受的是特定符号文本,然后经过选择、过滤、增删,将这些符号加工或还原成特定信息。与身体在场的交流不同,书写符号传播阶段,身体被悬置于括号内。与口语交流不同,书写符号可以超越身体而传播。身体总会生老病死,符号却永生。一旦思想被符号化,身体就退出传播过程。书写符号不仅超越了现实、抛开了身体,而且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身体速朽证明了符号的不朽。更为重要的是,符号强大的整合功能和组合能力将零碎、分散、

随机、流动的信息组织成相对固定的文本。因为知识的本义并不是注视或证明；知识的本义是阐释，符号往往包含自己内在的增生机制^[2]。这样，书写符号为新一轮的符号创制、组合游戏制订了规则。

在《词与物》中，福柯谈到了符号及符号化的文化意义。他认为相似性是符号化的基石，没有相似性，就没有符号，符号与物之间的相似性使符号成为物的代理，因此，符号体系“逆转了可见物与不可见物的关系”。福柯相信，在符号化的初始阶段，语言符号是物的完全确实和透明的符号。但符号化预示着这样的危险：符号有可能超越与具体的物之相似性，而指向自身。据此，福柯将词与物关系的逆转作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知识型上的根本断裂。最终，符号作为传播媒介就像货币作为流通媒介一样，它只关心自身的增殖空间和增殖潜能，而将其与物的关系通道完全关闭。这样，曾经作为媒介的身体就被搁置在符号中。因为身体既不与符号相关，又不与符号相似。身体在符号的狂欢中被肢解、拆卸。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人体延伸的同时，注意到“人的任何延伸都是‘自我截除’”。作为身体、语词之后的新媒介，符号必然要截除身体和语词。按照麦克卢汉“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的推论，先前的媒介被新媒介兼容并购，且只勉强充当新媒介的内容。这样，身体、语词等就被排除在媒介甚至传播过程之外。

在此，身体与身体的直接联系被割裂，身体在场的交流被符号传播所取代。在《交流的无奈》中，彼得斯的考察就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3]。虽然孔子、苏格拉底和耶稣都轻视甚或不屑于记录性的书写符号，但不管是对话还是撒播都是借助语言的特定符号系统完成的。当交流成为符号化传播以后，身体解放出来。交流既超越时空界限，也跨越生死分隔。

(身体) …→ 符号 → 媒介 …→ 符号 … 媒介 → 符号 …→ (身体)

图4

但符号化传播为人类文明造成一系列道德伦理后果。首先，它打破身体在场的交流民主。符号化传播直接意指着个体的各种符号能力，符号能力的缺失和不足必然影响其参与文化的权利。于是，文化不可避免成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个体化的具体身体不能自然地参与交流过程，个体的交流成本大大提高。传播因其门槛提高而丧失基本的民主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号化降低了传播的社会成本，却增加了交流的个体成本。从此，人类文明不过是

具有符号能力之身体的符号化操作。由于操作的主观性特征，看似客观公正的文明最终成为人类偏见的展演场。其次，符号化传播阶段，符号完全超越实存现实而创制、排列和组合，包括身体在内的实存现实就摒除在传播之外。这无疑导致了对身体的蔑视，超越身体有限性而创制的符号最终将身体扔出交流现场！再次，符号化传播引起道德的沦陷和堕落。由于符号解放并超越了身体，符号化传播就不必对具体身体负责，身体不是在读者、听众等符号中被抽象，就是在大众等群集性概念中被遗忘，超越在具体身体之外的符号就以不可遏制的方式自我繁殖。最终，文化创造服从于符号增殖的内在需要，对社会和文化的贡献也以创制、组合和拼贴符号的多少决定。今天再没有人敢理直气壮地标榜述而不作，孔子道德价值的等级秩序也完全被颠倒。

幸运的是，身体被排除，但身体并没有完全退出交流过程。身体书写的文字符号总是在渺远时空中呼唤别的身体。在此，符号总与物、与人类经验保持一定的相关性。在这个阶段，符号虽表现出明显的开放性，但这种开放性终止于词与物的具体关系中。

三、电子媒介与符号化身体

如果说，孔子的言传身教、苏格拉底的辩难和耶稣的现身说法囿于身体的界限而局限于交流中，那么孔门弟子、柏拉图和耶稣门徒则拉开了大规模符号传播的序幕。特别是随着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人类交流就进入规模化传播的大众化阶段。20世纪电子技术的发明不仅推动和加剧了符号化传播的趋势，而且使大众传播显示出各种新特征。

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催生了形形色色的新媒介，而且衍生出许多新的传播模式。电子传

播无疑是符号化传播的完善与推进。电子传播的传输速度战胜了时间和空间，如麦克卢汉所言，地球正变成一个小小的村落。传输速度和传输手段使符号和符号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与纸质媒介阶段的单一符号形式相比，20世纪各种视觉技术和视觉技巧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无疑使符号形式多样化。20世纪30年代，本雅明就以敏锐的哲学洞见看到了影像传播的文化潜能和政治学意义。与单纯的文字符号忽视身体或将身体抽象为文字符号不同，以摄影术为基础的视觉技术



时时表征着身体。但如果据此认为影像传播意味着身体在现代传播中的回归和再出场,那是没有看清影像的本质。确实,影像表征着身体,但仅此而已。视觉化的影像并非身体的物质性肉身,而是表达了特定观念价值的文化符号,是身体的影像化。影像是身体的某种提示物和替代品。从身体到影像的置换对于现代文明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文化价值,摄影术不仅重新发现了身体,而且“发明”了青少年这个独特的文化族群。但身体以影像方式呈现的时候,孱弱、生涩的青少年身体成为某种含义丰富的文化象征。可以说,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发明了青少年之后,青少年就成为现代性文明的深深伤痛。

电子传播不仅兼容了此前所有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而且根本改变了人类传播的基本格局。现代传播的各种视觉技巧掩盖了大众传播的本质。各种视觉技巧似乎将传播拉回到以身体为媒介的前语言阶段,正如本雅明所欢呼的,视觉文化蕴涵着文化民主的丰富潜能,无产阶级由此可以期待人类解放的来临。然而,视觉文化并没有为实现这种潜能提供保障,相反,它与信息传输技术纠结起来,共谋身体和实存现实。在大众传媒甚嚣尘上的当下,“眼睛注定是要看的,并且只是看;耳朵注定是要听的,并且只是听。”(米歇尔·福柯)铺天盖地的信息以光速传输,身体必然应接不暇。无法对信息做出有效反映,身体干脆调动自身的自我截除机制。因为“任何有机体或结构中的一切有用资源被调动起来之后,就会发生模式逆转的现象。”(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网络传播技术无所不在的今天,对沉迷于网络的青少年而言,网络就是其绝妙的精神家园。当外界的物质现实不足以刺激和满足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时,网络就成为其栖身的隐形空间。沉迷网络就是以一种隐形的方式呈现自我,构筑一种内向的精神乌托邦。

图4是图3在电子时代的升级版,电子传播兼容了各种符号形式和传播模式,各种符号形式在不同媒介之间转换传输,传播最终并不为身体或身体的内在要求服务,而是听命于媒介转换和传输的目的。于是,作为原始媒介的身体在一次次转换中被无限延搁,最终被符号剿灭。电子传播的符号网络不仅终结了词与物的关系,而且终结了身体的历史。传播则在符号-媒介-符号内部形成闭合回路。由此,“词独自漫游……词不再是物的标记”(米歇尔·福柯)。这样,符号自我增殖、自我指涉。符号不再与任何现实事物相联系,身体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证之一。

在电子传播阶段,媒介传输的信息就是符号本身。信息的传输和流动不再简单地经由媒介与身体发生作用,信息首先与其他媒介发生作用,经过媒介间的转载、转换、参照,最终又以符号的形式被接受。符号化的大众传播并不向身体保证什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彼得斯才断言:符号化的交流是“没有保证的冒险。凭借符号去建立联系的任何尝试,都是一场赌博。”电子传播中,“身体不再拥有无可辩驳的个性象征或人格象征。我们的面孔、行动、声音、思想和互动,已经全部迁移到媒介之中;在没有得到我们允许的情况下,媒介把我们个性的标记撒播开来。交流已经成为脱离人体的东西。”(彼得斯)

身体在无所不在的媒介和媒介信息的符号网络中,自我截除。身体被截除,符号化传播最终找不到终端。今天,撒播式广种薄收依然是大众传播最经典的隐喻。它不仅宣告了身体的危机和死亡,而且宣告了符号暴力的最终胜利。20世纪“大众社会理论中的5个‘A’——异化(alienation)、失范(anomie)、无名(anonymity)、冷漠(apathy)、原子化(atomization)”(彼得斯),无不与大众传播密切相关。在布努艾尔所认定的20世纪四大恶魔中,大众传媒是危害最大、影响最深的^[4]。

四、符号狂欢与身体死亡

媒介技术始于人体延伸的内在要求,“无身体接触而交流的梦想,不仅是茶余饭后的重要话题,而且是技术发明的关键条件之一”(彼得斯)。超越身体有限性的要求最终以身体死亡告终。由于符号从创制符号的身体剥离出来,自我指涉,自我繁殖,身体最终成为符号的垃圾场;符号堆积最终压跨了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今天,不负责任地传播,隐私权的侵犯,社会整体精神氛围的冷漠,都是规模化符号撒播的文化后果。在这些悲剧性的文化后果中,青少年的成长是媒体技术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其实,麦克卢汉早就预言了身体和青少年在电子媒介时代的悲剧。他说: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身体作为人类交流最初的媒介,总是在历次媒介革命中被搁置。当新媒介成为更新媒介的内容时,身体的悲剧命运似乎也就注定了。如果说书写媒介倾向于身体的分离和专门化,那么整合过往一切媒介形式的电子媒介无疑使身体分裂破碎。然而,专门化总是遮蔽或泯灭了社会良心(马歇尔·麦克卢汉)。于



是，波德里亚的“传媒恐惧论”就成为麦克卢汉媒介延伸论合乎逻辑的发展。在波德里亚看来，大众传播所导致的符号内爆（implosions）不仅使整个社会系统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每一种现实都被包容到‘符码’（code）和‘仿真’（simulation）的‘超现实’（hyperreality）之中。而主宰我们的是‘仿真’原则而不是过时的现实性原则”^[5]。于是，现实成为符号的创造物，身体成为符号的尸体。前语言和口语交流阶段，身体深度卷入交流过程而使身体本身成为冷媒介，历次媒介革命必然增加身体的热度，最终，身体终于不堪电子传播的灼伤，奄奄待毙而退出现代传播的文化视野。

今天，电子媒介倾向于在体外建立一个仿真的中枢神经系统，身体受到强烈刺激而进行拼死的、自杀性的自我截除。麦克卢汉曾强调：“热媒介有排斥性，冷媒介有包容性。”就人类传播历史看，冷媒介包容的和热媒介排斥的都是同一个东西——人类身体。现代传播割裂身体与身体间的联系，但人不能超越身体而存在。于是，身体无所事事，渴望与其他身体接触。这样，即使是以爱欲之名进行的肉体接触，也根本不触及思想和灵魂，普遍的人类爱沦为单纯的肉体快感。

在撒播式的现代传播格局中，传播往往只关注符号本身，看重符号操作过程，身体本身被组织成用于交换的符号。于是，身体死亡，符号狂欢。看来，阿多诺等人对大众传媒的观察和批判恰恰颠倒了因果。被动的大众身体不是大众传媒忽视身体的结果，恰好是其原因。不是身体制造符号，而是符号刻写、改造和重塑身体，当然特别是青少年的身体及其自我的日常呈现方式。身体成为符号的展示场所。当身体枯萎腐朽，符号依然鲜亮，人便热衷于收藏、保留各种符号文本。作为大脑的排泄物，符号堆积越多，身体的牢笼就愈益牢固，而文化能力欠缺的青少年无疑就成为当代社会的文化垃圾场。在醉心于收藏、保留符号的同时，人类同样热衷于蔑视生命、戕害身体。这样的戕害首先是从对身体的符号指认开始的：肉体、异端、他者、叛徒、犹太人、敌人、女人等。在大众传

媒喧嚣躁动的当下，符号已经转化成各种体制化的社会力量抵制、操弄身体，身体被身体的制造物所吞噬和淹没。由于大众传媒并不关注身体及身体的个性化需要，大众传媒的符号化操作就无所顾及。这恰恰是媒介伦理和媒介道德混乱和丧失的根本原因。

彼得斯很清楚身体在场的道德伦理价值。他认为：对话要求适当、有效和节省；撒播却鼓吹夸张、浪费和低效。作为神之子，耶稣撒播的并非自己的思想，而是神的教寓。可以说，耶稣是超越性符号与有限性身体的结合，符号媒介与身体媒介的杂交是人类文化最伟大的发明。耶稣撒播式的广种薄收显示神的博爱与威力。今天，大众传播不假思索滥用撒播，广种薄收已成为其主导性逻辑。这样，危言耸听、奢侈浪费就成为主导性的社会精神，媒介竞争不过是浪费的竞争。这恰恰是乔治·巴塔耶的普遍经济学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耶稣之撒播与孔子和苏格拉底之对话间的这种天渊之别，恰恰是彼得斯没有阐发的幽微之处。或许，现代传播的根本弊端不在于身体被忽视和悬置的事实，而在于这种忽视和悬置所造成的道德文化后果。

在各种终结、死亡此起彼伏的后现代语境中，回归身体，重估身体在场之交流的文化价值，可能是不无裨益的。当然，回归身体，重估身体价值，并不是鼓吹回到孔子和苏格拉底，也不奢望“人人说话，人人聆听”等虚妄的交流民主，而是希望在大众传播甚嚣尘上的当下，传播实践和传播理论能稍微给身体一个位置，偶尔回归交流的身体维度。更为重要的是，在传媒技术不断日新月异的今天，能够为青少年的成长营造一个相对安全干净的文化环境，因为青少年族群的当下状况决定了文明的未来走向。或许，这算是电子传播时代的身体挽歌吧。人类的技术发明总归有一个人性化的维度和向度，在互联网成为现实的当下，青少年不应该是媒介技术的牺牲者，而应该是媒体技术和现代传播的受益人。■

王彬：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 方奕

参考文献：

- [1]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M]. 何道宽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33.
- [2] 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M]. 莫伟民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1.55.
- [3] 彼得斯. 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M]. 何道宽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251.
- [4] 路易斯·布努艾尔. 我的最后一口气[M]. 刘森尧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208.
- [5] 让·波德里亚. 象征交换与死亡[M]. 车槿山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4-5.

身体、符号与媒介

作者: [王彬](#), [Wang Bin](#)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刊名: [中国青年研究](#) 
英文刊名: [CHINA YOUTH STUDY](#)
年, 卷(期): 2011(2)

参考文献(5条)

1. [马歇尔·麦克卢汉](#); [何道宽](#) [理解媒介](#) 2001
2. [米歇尔·福柯](#); [莫伟民](#) [词与物](#) 2001
3. [彼得斯](#); [何道宽](#) [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 2003
4. [路易斯·布努艾尔](#); [刘森尧](#) [我的最后一口气](#) 2003
5. [让·波德里亚](#); [车槿山](#) [象征交换与死亡](#) 2006

本文读者也读过(2条)

1. [徐群晖](#). [XU Qun-hui](#) [论游戏的媒介传播](#)[期刊论文]-[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8(3)
2. [孟庆涛](#) [身体在后现代的遭遇——以福柯的刑罚哲学为例](#)[期刊论文]-[学术交流](#)2010(3)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qnyj201102010.aspx